

抗战时期的孙越崎

薛 毅

孙越崎先生是我国现代工矿业的泰斗,能源工业的奠基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怀着极大地爱国热忱,冲破重重阻力,在抗战后方建起了一批现代化的煤矿,创办了玉门油矿,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被人们誉为中国的“煤油大王”。

—

孙越崎(1893—),浙江绍兴人。他1916年自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并被当选该校学生会会长。1919年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校方开除,后得蔡元培先生帮助,转入北京大学采矿系。毕业后,他怀着“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只身一人来到祖国边陲黑龙江,在地处旷野荒漠的穆棱煤矿担任矿务工程师,一干就是6年,经历了一个煤矿从勘探、建井、投产的全部生产建设和管理过程。1929年,他赴美留学,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到英、法、德等国煤矿学习。1932年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工作,次年被派任陕北油矿探勘处处长。

1934年秋,由中英合资经营的河南焦作煤矿由于管理不善,债台高筑,濒临破产。孙越崎临危受命,担任该矿的总工程师和总经理。他上任后对煤矿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大刀阔斧地整顿: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平衡采掘关系,狠抓运输销售。第一年不仅扭亏为盈,而且盈利额超过100万元;第二年就使焦作煤矿成为国内仅次于河北开滦、山东中兴的全国第三大煤矿。正当孙越崎积极购置设备、招标建设新井、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之际,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

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沿着平汉铁路向南进犯,于10月中旬侵占了豫北重镇安阳。日军若继续南下占领新乡,就控制了新乡至焦作矿区的铁路专用线,而煤炭无疑是当时日军势在必夺的重要战略物资。这一时期,日军的侦察机经常在焦作矿区上空盘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派来工兵准备炸毁焦作煤矿的矿井及主要机器设备^①。焦作矿区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在此形势危急之际，身为经营焦作煤矿的中福联合处总经理的孙越崎鉴于战火即将蔓延到矿区，铁路方面不仅军运繁忙，而且运输随时可能中断的局势，首先决定中福联合处所属矿厂于1937年10月22日停止生产，突击抢运外销存煤。然后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果断下令将中福联合处的主要机器设备及技术人员迁到抗战后方——武汉。

南迁设备和人员的决定首先遭到中福联合处董事会中方董事的共同反对。他们以“此系河南财产，不能拆迁”为主要理由，强烈反对转移设备。为此，孙越崎向他们耐心解释，指出：“大敌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一，不拆不迁，则敌人可利用，我们不能利用；二，全部破坏，敌我都不能利用；三，全部拆走，我们可利用，敌人则不能利用。听了孙越崎的意见，中方董事们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拆迁设备。

孙越崎南迁设备的决定也遭到英商福公司的强烈反对。福公司从19世纪末就开始在焦作矿区建矿修路，先后投资数千万元，存有大量的动产和不动产，如果拆迁势必损失巨大。加上抗战初期，英国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是绥靖政策，对中国不提供实质性的支持。所以，当福公司驻中福联合处代表贝尔得知孙越崎决定迁移设备时，明确表示反对，并且声称：“英国与日本是友邦。日本人来了，不会损害我们的权益。”孙越崎听后针锋相对地回答：“日本是你们的友邦，却是我们中国人的敌人，我们一定要走。”贝尔经请示设在伦敦的福公司董事会，只好同意随迁，并提出福公司在华人员跟着孙越崎一起转移。这在抗战初期中国数以千计的外资企业中是绝无仅有的。

一波甫平，一波又起。正当孙越崎组织员工夜以继日地抢运设备时，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和焦作市党部串通一气，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公署设在新乡的军法处诬告孙越崎在焦作煤矿制造停工停产，大肆拆运设备，动摇后方民心，有汉奸嫌疑，要求将其逮捕法办。军法处不问青红皂白，立即电传孙越崎，令其一日之内赶到新乡投案，否则派人前来抓捕。孙越崎接到电话后，从容不迫地让人记下他走后矿上拆迁工作的各项安排，以防不测。随后他仅带一名营业科长赶赴新乡，到第六战区军法处面陈详情，说明拆迁设备是破釜沉舟，决心抗战到底，最终得到军法处的理解，化险为夷。

孙越崎回到焦作，继续指挥拆迁设备。与此同时，他还在焦作成立了中福保管处，负责销售存煤以及维持矿区供电、供水等事宜。当日军攻占了距新乡仅二三十公里的卫辉时，孙越崎才从火车窗口爬进车厢，乘车到了郑州。当他得知日军暂时没有继续南侵时，就不顾生命危险又回焦作矿区，继续指挥拆迁设备。1938年2月中旬新乡即将沦陷时，孙越崎才指挥一列满载拆迁设备的列车，在中国士兵炸毁黄河大桥之前通过大桥。这是最后一列通过黄河大桥的列车。至此，孙越崎共指挥拆迁转移设备约4000吨，转移技术人员800多名，为当时抗战后方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中福联合处迁至武汉办公之时，正值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因战乱相继迁来武汉。这些工厂恢复生产，急需煤炭做动力，尤其是一些承接军需用品的厂家，更因缺乏燃料而难以为继。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准备与日军决战，因而兵员调动频繁。浙赣、湘桂、粤汉等铁路运输繁忙，机车用煤量激增。当时武汉地区每月需煤约4—5万吨，而原来由开滦、井陉、中福、中兴、淮南各矿运来之煤，因矿区沦陷或交通梗阻已完全断绝。正当武汉面临严重煤荒之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钱昌照得悉中福联合处大批设备和人员迁来武汉，立即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与之合办

距武汉不远的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

为了慎重起见,孙越崎亲自来到湘潭,到矿区实地勘查。通过化验,孙越崎欣喜地发现这里“煤质甚佳,为长江以南各矿之冠”^⑧。他还看到这里“水陆交通,较为便利”,便代表中福联合处与资源委员会于1937年11月15日签订双方合组湘潭煤矿有限公司的合同。商定资源委员会方面出资金,中福联合处方面出机器设备,孙越崎担任总经理。随后,孙越崎先后安排从汉口运到谭家山矿1600多吨机器设备,价值109万多元。

为了早日支援抗日战争,孙越崎制定了边勘探边采煤的原则,开发计划分为临时、永久两期。经过10个月的紧张工作,谭家山煤矿已凿成直井8口,斜井两口,虽未正式投产,但日产量已达390吨左右,这些煤炭通过湘江船运,大部分销售到长沙、武汉两地,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1938年6月下旬,日军攻占了九江。为了防止不测,孙越崎将湘潭煤矿公司员工的家眷及尚未安装的机器设备转移到四川。到了11月初,战火已蔓延到岳阳、长沙,孙越崎即下令谭家山矿停止生产,一部分员工携带贵重设备分乘汽车取道桂林、贵阳进入四川;一部分员工组成矿区财产保管处,留守谭家山煤矿等待时局好转。

四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大批工矿企业又从武汉等地迁到抗战的大后方——四川。1938年初,四川天府煤矿公司董事长兼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向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翁文灏提出:“重庆乃陪都所在,工厂众多,燃料之需激增,加强后方煤矿工业,诚有利抗战建国之大业”,请求安排一个煤矿与天府煤矿合作,并保证负责优先把该企业的机器设备运进四川^⑨。在翁文灏的安排下,孙越崎与卢作孚进行了洽谈。为了统筹安排,孙越崎专程到距重庆60多公里的天府煤矿实地考察。据孙越崎回忆,当时天府煤矿“上山煤已采完,全靠采下山煤。采掘全用手工,煤从下山用人工背上来,用竹篓绳子背在肩上,两手两足都抓住铺在底板成“其”字形的梯子上,用竹篓一步一步地背上来。抽水也用人工,每人用一根约一丈的竹筒,打通竹节,一丈远一个水池,一丈远一个人,连续往上抽水,看了使人心酸。加以通风不良,坑内很热,工人全是裸体,背煤工人背到平洞,再拖到洞口,一经风吹、易受感冒,死亡率很高。”^⑩与此同时,孙越崎也看到天府煤矿的三个优势:一,有一条17公里长的20磅钢轨可运5吨重煤车的轻便铁路,从矿区直达嘉陵江边;二,煤层较厚,可采的煤层有两层,一层厚2—3米,一层厚1.5米,储量丰富;三,由嘉陵江下运重庆不到100公里,运输便利。”^⑪经过权衡利害得失,孙越崎决定前来合作,并提出需将北川铁路与天府煤矿合并,实行路矿合一。

1938年5月1日,由孙越崎任总经理的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孙越崎上任后首先将天府煤矿原来实行的用工制度——租客制改为里工制。租客制主要特点是矿方依靠包工头管理矿工。这种制度的弊端,一是生产大权完全掌握在包工头手里,生产的煤炭不能由矿方自由支配,矿方仅能从煤产量中抽取16—24%,包工头所得往往高于矿方;二是租客制工人流动性极大,难以熟悉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而里工制则由矿方直接招募、管理矿工,直接支付工资。为此,孙越崎多次派人潜入已沦陷的河南焦作和湖南湘潭等地,先后招募了1000多名技术工人,为发展生产打下了基础。

为了提高产量,孙越崎将天府煤矿沿袭多年的土法采煤改为比较先进的长壁式采煤法。为了实现在生产机械化,孙越崎决定公司自建电厂。在基本建设和生产技术改造两方面,孙越崎制

定了“边建设,边生产,先重点,后其它”的方针,从而使天府公司的产、运、销各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垄断了重庆及川北的煤炭市场,使天府煤矿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1937年,天府煤矿仅生产煤炭9万多吨,1941年达到16万多吨,1943年达到35万多吨,1945年达45万多吨^⑥。

孙越崎掌握了天府矿业公司的大权后,于1939年1月安排中福联合处与资源委员会和重庆的银行家宁藏村在四川西部的犍为县合办嘉阳煤矿,年产煤炭10至12万吨,供应嘉定、成都、宜宾、泸州等地。

1939年秋,孙越崎又授意中福联合处与四川省建设厅合作在隆昌县接办石燕煤矿公司,生产的煤炭主要供应内江和自贡糖、盐工业区。

1940年6月,孙越崎又责成中福联合处分拨机器,投资98万元,与资源委员会和财政部盐务总局合办四川威远煤矿。该矿年产煤炭约10万吨,其中一部分供应自流井、贡井煮盐和资中糖厂、酒精厂等用,一部分运销到内江、资中、仁寿、井研、五通桥、宜宾等地。

至此,孙越崎领导的中福联合处已在四川投资建立4个煤矿。为了便于“统一资金,统一业务,统一行动”,孙越崎决定将这4个煤矿联合成立一个总公司,这个总公司与中福联合处在重庆合署办公,帐目各自分管;秘书、总务、材料及勤务员合为一套人马,费用分摊。总公司总经理由孙越崎担任。这样一来,既节省了开支,又提高了办事效率。在孙越崎的统一指挥下,各矿资金可以互相流动周转,生产的煤炭可以互相调拨,甚至一些劣质煤也可以搭配销售。随着生产的发展,孙越崎又相继安排中福联合处在四川投资建设东林矿业公司、全济煤矿公司和成都燃料公司。

总而言之,由孙越崎领导的中福联合处是抗战时期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家迁到后方的以经营煤矿为主的企业,它所生产的煤炭供应四川全省一半以上的工厂生产和民用,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五

抗战期间,孙越崎的另一贡献就是在戈壁荒滩上建成了当时我国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玉门油矿。

石油与煤炭是近代工业的两大生命线,石油被称为“工业的血液”。早在1933年,孙越崎从美国留学回国不久,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就派他到中国大陆最早的油矿——陕北延长油矿一带调查石油资源,并委任他为陕北油矿探勘处处长。当时我国仅在西北地区发现几处油田,且产量少得可怜,国内需用的油产品绝大部分依赖进口。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地区相继沦陷,油产品来源断绝,汽车、飞机等用油无着,只得以酒精替代。为了缓解油荒,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于1938年底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1941年3月16日正式成立甘肃油矿局,任命孙越崎为总经理,主要经营玉门油矿^⑦。

玉门油矿在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上,西到玉门县30公里,西北距兰州820公里,东至嘉峪关80多公里,东南距重庆约2500公里。这里海拔2400多公尺,遍地砂碛,草木不生,气候严寒,每年结冰期在6个月以上,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孙越崎上任后,他看到油矿需用的钻机、套管等设备当地不能生产,只能在重庆订购;打井用的水泥和重晶石当时也仅有重庆生产,他就把甘肃油矿局设在重庆牛角沱,专办财务及购买设备材料、生活必需品,组织了一个拥有近400部卡车的运输处,往返于重庆、玉门之间,一方面向玉门运进各种物资,一方面从玉门运出

各种油产品。

油矿开办后,矿上的工人主要来源于当地酒泉、玉门、金塔三县的农民;矿上的职员除少数是从其它单位调来的之外,大部分是从西北工学院、西南联大化学系等校招聘来的应届毕业生。由于当时油矿条件艰苦,尤其是男职员找对象难,致使很多青年职员不安心工作。为此,孙越崎有意识地从重庆等地招聘了许多女青年来油矿,把她们安排在会计、财务、医务、学校等部门工作。“这不但使矿区青年的生活大为活跃,而且后来不少人在那里结下良缘,安下心来,长期在矿区工作。”^⑩

在当时各方面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为了支援抗战,孙越崎怀着强烈地爱国热忱,每年“夏秋期间在老君庙矿场督促油矿生产建设,冬春在重庆”^⑨,率领职工胼手胝足,用汗水在戈壁荒滩上建起了一座新兴的石油工业城。玉门油田的原油产量由1939年的128784加仑,增加到1944年的2120万加仑,6年中共生产原油7867万加仑;汽油由1939年的年产4160加仑,增加到1944年的405万加仑,6年共生产汽油1303万加仑;柴油由1939年的年产7339加仑,增加到1945年的27万加仑,7年共生产柴油71.7万加仑;煤油由1939年的4101加仑,增加到1945年的165万余加仑,7年共生产511余万加仑^⑧。这些油产品在抗战期间无论对于中国军队在前方作战还是后方经济建设及民用,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42年,日军企图从黄河的风陵渡侵入陕西,我方汽车正是用玉门油矿生产的汽油,将苏联供应的大炮从新疆赶运到前线,从而粉碎了日军的企图。1944年,美国空军使用玉门生产的航空油,从成都起飞轰炸了日军占领的河北开滦煤矿电厂和日本首都东京,从而加快了我国抗战胜利的进程。

1942年8月26日,蒋介石曾亲临玉门油矿巡视,对孙越崎慰勉有加。随后他又安排蒋经国、蒋纬国二人前来参观。这一年在兰州举行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上,孙越崎因为在四川办煤矿和玉门建油田成绩卓著,被该会授予一枚金质奖章,成为该会自成立以来,继凌鸿勋、侯德榜、茅以升和支秉渊之后,第五位金奖得主,孙越崎从此被誉为中国的“煤油大王”。

注 释:

①④⑤ 孙越崎,《中福煤矿的坎坷道路》,载《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165页。

② 孙越崎,《湘潭谭家山煤矿初期工程计划及预算》,现存河南省档案馆福公司卷宗第3236页。

③ 天府矿务局编,《天府煤矿简史》(打印本),第33卷。

⑥ 详见《第六次中国矿业纪要——西南区》,第66页。

⑦ 详见董蔚翹,《玉门油矿的发现与开采》,载《传记文学》(台湾版)第21卷第2期,第66页。

⑧ 吴京,《越过崎岖路 走向康庄道——记著名矿业专家孙越崎》,载《人物》1983年第5期,第16页。

⑨ 沈嘉元,《孙越崎传略》,载《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9年版,第5页。

⑩ 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中册,第648页;又见《第七次矿业纪要》第86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